引用格式：张宗军，党新宇. 企业“内卷式”竞争何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J]. 技术经济，2026，45(9)：1-12.

Zhang Zongjun，Dang Xinyu. How does firms’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affec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J].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2026，45(9)：1-12.

反内卷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内卷式”竞争何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张宗军[1]，党新宇[2]

（1. 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兰州 730020；2. 兰州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兰州 730020）

摘 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跃升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标志，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摆脱要素依赖、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市场增长红利消退与同质化竞争加剧，“内卷式”竞争成为制约实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基于2009—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市场行为扭曲、产业链信用挤压和人力资源配置失衡三个维度构建企业“内卷式”竞争指数，实证分析了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在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其他特征、替换核心变量及剔除特殊样本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该负面影响在融资约束较高、供应链风险较大及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内卷式”竞争会通过加剧产能过剩、弱化内部控制两条核心路径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且其负面影响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放大。研究结论为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产能过剩；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6)09-0001-12

DOI：10.12404/j.issn.1002-980X.J26030903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通过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破除卡点、堵点，要在“破”上出实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是“十五五”时期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的重点任务之一。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与增长红利逐渐消退，部分企业逐渐从增量拓展转向存量争夺，“内卷式”竞争日益成为困扰中国实体企业效率提升的突出难题。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74311亿元，较上年下滑3.3%①。在具体行业中，“内卷”现象尤为严峻。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新能源汽车零售均价从2023年的18.4万元降至2024年的17.2万元，同比下降6.5%②。在贴近居民终端需求的食品制造业，需求不足与价格低迷并存，2024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仅上涨0.2%，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6%，从侧面反映出终端消费领域面临较强的价格竞争压力③。在要素成本刚性上升与市场需求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下，企业长期陷入低水平竞争循环，不仅加剧了企业的短期经营压力，还挤占了其产能优化和治

收稿日期：2026-03-09

基金项目：甘肃省重点人才项目“科技金融驱动甘肃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2025RCXM010)

作者简介：(通信作者)张宗军(1979—)，博士，兰州财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商业保险、风险管理；党新宇(1999—)，兰州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风险管理。

①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02-28，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②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2025年乘用车价格段市场结构分析》，2025-02-14，https://npo00410y.npoall.com/news/itemid-100965.html。

③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2024中国食品产业运行趋势报告》，2025-03-25，https://cfnews.com.cn/nianjian/detail/55604.html。

理改进的所需资源，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如何有效抑制“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聚焦核心能力建设与效率提升，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

竞争方式作为企业的战略导向，对企业创新能力培育与经营绩效提升具有深远意义[1]。经典战略理论通常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归纳为差异化与成本领先两类基本路径。前者旨在通过提供具有独特性的产品或服务，塑造差异化优势，从而增强客户忠诚度、提升品牌价值并实现更高利润率[2-4]；而后者则致力于实现企业成本最小化，通过规模效应与流程优化在短期内获取竞争优势，但长期可能面临创新动力不足与竞争优势难以持续等挑战[5-6]。无论是差异化战略还是成本领先战略，其共同点都在于企业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定位作出主动选择，并将资源配置引向技术积累、组织优化和效率的提升。然而，当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产品同质化加剧时，竞争可能偏离价值创造轨道，演变为低水平的“内卷式”竞争。与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不同，“内卷式”竞争不追求价值创造或系统性效率提升，而是在有限存量市场中，以过度内部消耗、同质化价格战、牺牲长期发展能力为特点的恶性竞争模式，从而严重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体现企业在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方面的综合表现，其本质是摆脱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路径，转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培育微观企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进而助推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现有研究已围绕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展开充分探讨，其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司法监管[7]、产业政策[8]等制度因素；供应链持股[9]、政府引导基金[10]等金融资源，以及数字化转型[11]、人工智能[12]等新技术应用。此外，企业竞争行为也逐渐被纳入生产率分析框架。部分研究从经典竞争战略出发，考察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3-14]；另一部分研究则关注“内卷式”竞争的生产率后果，发现企业或地方政府层面的低水平竞争会通过削弱创新能力、降低市场有效性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5-16]。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依赖于技术升级、效率提升和非恒定规模报酬引致的生产效益[17]，要求企业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持续创新并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而“内卷式”竞争则会导致企业资源配置和组织运行效率扭曲，其将资本要素引向非生产性的促销让利与市场争夺，将生产要素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同质化产能扩张上。同时，管理层注意力也被现金流维护和短期业绩压力所挤占，严重侵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础。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9—202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多从理论层面对“内卷式”竞争的表现、成因及治理路径展开讨论，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开始尝试从企业经营表现对“内卷式”竞争进行量化识别。本文则从竞争压力的生成和传导过程出发，沿市场行为、产业链信用和人力资源配置构建指标体系，验证了“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为国家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了实证依据。第二，深入剖析了“内卷式”竞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渠道，从产能利用和内部控制两个企业内部经营环节考察其传导机制，发现“内卷式”竞争会通过加剧产能过剩、弱化内部控制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为破解内卷困境提供了靶向依据。第三，丰富了企业竞争行为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多围绕经典竞争战略理论，对企业主动选择的价值创造型战略展开分析，而较少关注外部环境压力下催生的非价值创造型被动竞争行为。本文以同质、低效的“内卷式”竞争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效应分析

“内卷化”是指社会或组织既缺乏突破性发展，也难以维持持续性增长，长期处于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的状态。经典竞争战略理论认为，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路径有二：一是通过产品独特性、品牌价值构建溢价能力的差异化战略；二是通过系统性效率提升实现低成本的成本领先战略。市场竞争能够激发企业活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最终实现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整体福祉的增加。但“内卷式”竞争并非单纯的竞争过度，而是企业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为了争夺存量市场，进行同质化的、以牺牲利润和未来为代价的恶性竞争[18]。从资源约束理论视角来看，当企业面临融资难、关键人才短缺、技术获取受限等严峻资源约束时，企业倾向于将稀缺资源分配给低风险、易模仿的存量竞争，进而被“锁定”在内

卷路径上。当前，“内卷式”竞争在中国不少行业、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首先是表现形式有市场行为扭曲、产业链信用挤压及人力资源配置失衡[19]。一是市场行为扭曲，其核心特征之一是恶性价格竞争，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持续采取降价、发起或参与价格战等策略，以超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下降；二是部分企业耗费大量资源布局广告投放、渠道拓展等营销竞争环节，但产品品质与服务水平并未同步改善，使得市场竞争陷入重宣传、轻品质的恶性循环；三是企业盲目跟风、扎堆扩产，不仅造成产业内重复建设问题突出，还导致企业难以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20]。其次是产业链信用挤压，存量竞争压力会进入企业信用安排之中，企业为了转嫁成本和刺激销售，延长对上游供应商的付款账期，并向下游渠道商提供过度宽松的信用政策，从而形成全链条恶性循环[21]。最后是人力资源配置失衡，在部分行业人才稀缺的背景下，企业为了快速构建人才优势、抢占市场先机，而进行过度招聘，导致人岗不匹配或人才闲置。而且部分企业习惯于通过增加人手来应对竞争压力，这种“以量取胜”的用人思路，加剧了行业内人力结构的失衡。组织惰性理论认为，当“内卷式”竞争成为行业普遍遵循的惯例后，组织惰性会从结构与认知两个维度阻碍企业转型。在结构层面，企业为应对价格战而建立的庞大销售团队或过剩产能，会转化为战略调整的沉没成本与组织负担；在认知层面，管理层长期习惯于“以价换量”的竞争思维，对差异化创新机遇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市场反应迟钝。这种双重惰性使得企业即便认识到内卷的长期危害，也难以主动跳出舒适区，最终导致行业竞争模式在低水平上自我循环。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应等。“内卷式”竞争导致的价格战和营销战，严重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为维持生存，企业被迫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非生产性的、低效的营销推广和价格补贴上以抢占市场份额，并倾向于进行低风险、低门槛的同质化研发，严重阻碍了企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放缓，使企业热衷于模仿和跟风，进一步抑制了技术前沿的拓展，形成恶性循环。同时，产业链信用挤压扰乱了资源在上下游之间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企业通过延长付款账期和提供过度信用政策，虽然短期内缓解了企业的销售或周转压力，但实则破坏了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资金周转速度，造成全链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此外，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衡，容易产生人岗不匹配现象，“以量取胜”的用人思路导致大量高素质人才的低效利用，不仅造成人力成本攀升，更使得组织内部管理复杂度增加，沟通协调成本上升，规模效应难以发挥，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综上，“内卷式”竞争带来的市场行为扭曲、产业链信用挤压、人力资源配置失衡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在低效的存量争夺中，对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多个关键维度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内卷式”竞争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H1）。

（二）中介机制分析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依赖于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与组织系统的有序运行。而“内卷式”竞争作为企业在市场压力下形成的低水平竞争行为，会沿着企业内部经营链条持续传导，改变企业的产能利用状态和内部控制质量。因此，分别从加剧产能过剩与弱化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深入考察“内卷式”竞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作用机制。

1. 加剧产能过剩

产能利用率不仅是劳动力市场与市场需求的前瞻性指标，也是企业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评估的关键参数[22]。当企业“事前”的生产计划与“事后”的市场需求存在偏差时，就会造成产能过剩[23]。企业间竞相压价、产品同质化泛滥、人才争夺白热化，会压缩利润空间并削弱企业根据真实需求调整生产计划的能力，从而抑制既有产能的有效释放。在利润微薄的经营压力下，企业既缺乏维持满负荷生产的经济激励，也缺乏进行产能优化的财务能力，致使厂房、设备及劳动力等关键生产要素大量闲置。过度营销虽然短期内会使销量增长，但并不能改变市场的实际需求。同质化竞争驱动的盲目跟风与重复建设，促使企业涌入相同赛道并盲目扩张产能，使行业整体的供给能力迅速超越市场需求的上限，进一步拉大了供给和需求的差距。供需错配还会降低产业链内资金周转效率，导致全链条企业运营不畅，从而间歇性停产或减产。产能过剩会导致要素市场扭曲，并引发企业间的资金挤占。产能过剩企业占用的信贷资源会削弱其他企业的融资可得性[24]，使生产要素难以向高

效企业流动,导致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长期处于帕累托次优状态。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遏制了企业研发创新、产业升级的意愿和能力[25],从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6-27]。

基于上述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内卷式"竞争会加剧企业产能过剩,从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H2)。

2. 弱化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本质上是依托分工体系形成的权力制衡与信息传导双重机制,以价值创造为导向、贯穿企业管理全流程,是影响组织运行效率的核心内在要素[28]。"内卷式"竞争塑造的非理性市场环境,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成了系统性挑战。一方面,"内卷式"竞争挤压了企业资源,迫使其削减内控投入;另一方面,生存压力促使企业管理重心偏向短期业绩与现金流维护,内控职能被弱化或被临时调配以应对经营压力。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实现对生产运营的监督与管控,助力企业结合自身核心优势优化核心流程,聚焦未来发展趋势开展前瞻性布局,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筑牢坚实基础[29],并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30]。相反,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股东和潜在投资者会认为企业存在投资风险,进而引发股价下跌、业绩下滑、债务融资成本攀升等一系列负面市场反馈[31],从而削减企业资金获取能力,使企业难以进行有效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升级。此外,内部控制能力的不足会直接侵蚀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降低其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调整能力,最终导致企业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格局中,难以维系持续稳健的经营状态。

基于上述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内卷式"竞争会弱化企业内部控制,从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H3)。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以2009—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ST(special treatment)和*ST、金融行业样本;②剔除主要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21217个年度-企业观测数据,并对所有连续性变量采取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相关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内部控制水平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企业总产出中无法由传统要素投入(如资本与劳动)解释的"剩余"生产能力,采用LP(Levinsohn-Petrin)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2. 解释变量

从市场行为扭曲、产业链信用挤压、人力资源配置失衡三个维度构建企业"内卷式"竞争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最终得到各企业的"内卷式"竞争综合指数。相较于既有研究沿经营财务链条识别企业"内卷式"竞争,本文更关注竞争压力在市场竞争行为、上下游结算关系和人力资源配置环节中的传导与呈现。具体而言,在市场竞争行为维度,营业毛利率的下降直观反映了企业通过让渡利润参与价格竞争;销售费用率的上升意味着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向促销和营销等非生产性、非创新性竞争环节,容易挤占技术研发和产品改进所需资源;颠覆式专利数量用于反向识别企业突破式探索能力不足,颠覆式专利越少,说明企业越可能倾向于成熟技术和短周期改良,难以依靠突破式创新摆脱同质化竞争;专利知识宽度用于反向识别企业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不足,反映企业为降低研发风险、追求短期收益,倾向于扎堆热门成熟技术领域开展研发,导致技术路线趋同,同质化技术竞争进一步加剧。在上下游结算关系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用于刻画企业对下游客户的资金回收效率,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说明企业通过延长信用期限或放宽信用条件维持销售规模,使价格竞争进一步延伸为信用竞争;应付账款周转率用于刻画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付款效率,应付账款周转率下降,说明企业通过延迟付款缓解自身资金压力,将经营压力向供应链前端转移。企业应收、应付账款周转率的同步走低,反映了企业在存量竞争中通过账期安排和商业信用转嫁压力的行为,破坏了产业链上下游的互信基础,最终导致产业链整体资金周转效率下降。在人力资源配置维度,企业超额

雇员率用于识别企业员工数量是否超过业务规模所能解释的合理水平。若新增人员缺乏相应的业务处理能力，人员扩张不仅会推高人力成本，还会引发人岗错配、协调成本上升和管理效率下降问题，使人才竞争由能力建设演变为低效的资源消耗战。企业“内卷式”竞争指标体系构成见表1。

表1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指标体系构成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算方法说明	指标方向
“内卷式”竞争	市场行为扭曲	价格竞争	营业毛利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负
		营销竞争	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营业收入	正
		同质化竞争	颠覆式专利	参照张川和刘杰[32]的研究，以企业颠覆性发明、实用专利数量之和的自然对数衡量④	负
			专利知识宽度	参照李宏等[33]的研究，以发明、实用型授权专利在不同专利组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⑤	负
	产业链信用挤压	供应商竞争	应付账款周转率	营业收入/应付账款平均余额	负
		渠道商竞争	应收账款周转率	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负
	人力资源配置失衡	人才竞争	超额雇员率	参数廖冠民和沈红波[34]的研究，以行业平均收入与雇员平均规模的关联测算⑥	正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影响资源禀赋与生产分工效率；企业年龄（*Age*），反映经营经验与技术积累水平；资产负债率（*Lev*），体现财务杠杆与风险水平；固定资产比率（*FAsset*），反映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托宾 *Q* 值（Tobin*Q*），衡量企业成长机会与市场估值；企业现金流量（*CashF*），决定企业投资与竞争的资金支持能力；两职合一（*Dual*），影响决策效率与风险偏好；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itution*），通过监督治理与资源赋能，进而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竞争策略选择。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计算方法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	*TFP_LP*	采用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内卷式”竞争	*IntenseC*	熵权TOPSIS法测算，见表1
企业规模	*Size*	ln（企业总资产）
企业年龄	*Age*	ln（企业上市年龄）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固定资产比率	*FAsset*	固定资产/总资产
托宾 *Q* 值	Tobin*Q*	总市值/总资产
企业现金流量	*CashF*	企业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为1，否则为0
机构投资者持股	*Institution*	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三）描述性统计

表3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_LP*）的平均值为8.9692，中位数为8.859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8633和11.5946，说明中国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分布相对集中；企业内卷式竞争（*IntenseC*）的平均值为0.0957，中位数为0.0669，平均值高于中位数，存在明显的右偏分布特征，即少数企业的内卷式竞争程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其余控制变量与已有文献相似，不再赘述。进一步对变量进行VIF检验，平均值为1.28且全部小于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④ 以国际专利分类号为基础，当企业在 t 年申请的某专利知识元素未在该企业前五年中出现时，则判定该专利为企业在 t 年的一项颠覆性专利。

⑤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思路，在大组层面上定义企业专利知识宽度为：$Patentknowledge_{it}=1-\sum\left(\frac{Z_{imt}}{Z_{it}}\right)^2$。其中，$Z_{imt}$ 为企业 i 截至 t 年在 m 大组下发明与实用新型申请专利的累计数目，Z_{it} 为企业 i 截至 t 年在全部大组下申请专利的累计数目。

⑥ 以行业平均收入与雇员平均规模的关联为基础测算公司的超额雇员率：$ExEmp=\left(Emp_firm-Sales_firm\times\frac{Emp_ind}{Sales_ind}\right)/Emp_firm$。其中，*ExEmp* 为超额雇员率，*Emp_firm* 为企业的员工人数，*Sales_firm* 为企业的销售收入，*Emp_ind* 为公司所处行业的平均员工人数，*Sales_ind* 为公司所处行业的平均销售收入。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TFP_LP	21217	8.9692	8.8595	6.8633	11.5946
IntenseC	21217	0.0957	0.0669	0.0241	0.4332
Size	21217	22.7013	22.5228	20.2577	26.6281
Age	21217	3.0640	3.0910	2.3979	3.6636
Lev	21217	0.4625	0.4629	0.0786	0.8965
FAsset	21217	0.2235	0.1926	0.0054	0.6735
Tobin*Q*	21217	1.8913	1.5419	0.8146	6.9891
CashF	21217	0.0511	0.0477	−0.1180	0.2338
Dual	21217	0.2367	0	0	1.0000
Institution	21217	44.4569	45.9804	0.5342	90.9317

（四）模型设定

第一，为检验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构建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模型设置如式（1）所示。

$$TFP_LP_{it}=\alpha_0+\alpha_1 IntenseC_{it}+\alpha_j control_{it}+\theta_i+\theta_t+\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TFP_LP* 为被解释变量；*IntenseC* 为解释变量“内卷式”竞争；i 为个体；t 为时间；$control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θ_i 和 θ_t 分别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_{it} 为随机扰动项；α 为待估系数。

第二，为了检验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采用两步回归法的中介效应检验思路，对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设定模型如式（2）所示。

$$M_{it}=\gamma_0+\gamma_1 IntenseC_{it}+\gamma_j control_{it}+\theta_i+\theta_t+\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M_{it} 为一系列中介变量；γ 为待估系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 展示了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1）列结果显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回归系数为−2.7822，在 1%的水平上显著；（2）列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6861，在 1%的水平上显著；（3）列进一步加入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后，回归系数为−0.5204，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在有限市场空间内进行同质化恶性竞争的行为，使得大量资源浪费于低效的存量争夺中，阻碍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假设 H1 得证。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变量	（1）	（2）	（3）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IntenseC	−2.7822***	−0.6861***	−0.5204***	*Size*		0.5940***	0.5563***
	（0.1871）	（0.0933）	（0.1108）			（0.0084）	（0.0162）
Age		−0.0023	0.1034	*Lev*		0.5844***	0.0188
		（0.0307）	（0.1346）			（0.0506）	（0.0519）
FAsset		−1.3191***	−0.9584***	Tobin*Q*		−0.0084	0.0301***
		（0.0642）	（0.0789）			（0.0065）	（0.0056）
CashF		1.9522***	1.0181***	*Dual*		−0.0203	0.0043
		（0.0977）	（0.0603）			（0.0164）	（0.0115）
Institution		0.0025***	0.0016***	*_cons*	9.2355***	−4.6067***	−3.9035***
		（0.0004）	（0.0005）		（0.0296）	（0.1872）	（0.5519）
个体固定效应	No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No	Yes
样本量	21217	21217	21217	R^2	0.0465	0.7399	0.945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由遗漏变量等潜在因素引致的内生性偏误，选取除本企业外当年同行业平均“内卷式”竞争水平（*industry_IV*）作为“内卷式”竞争（*IntenseC*）的工具变量。同行业企业存在普遍的竞争参照与行为扩散，其“内卷式”竞争水平具有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的条件。同时，行业层面的“内卷式”竞争水平主要刻画行业内部竞争环境，与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路径，符合外生性约束。不可识别检验 $p=0.0000$、弱工具变量检验 $F=110.0210$，检验通过，说明变量选取合理。从表 5 的（1）列和（2）列可以看出，*TFP_LP* 的系数在 2SLS 模型中显著为负，“内卷式”竞争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

2. 控制其他特征

基准回归模型已控制了企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但行业景气变化和地区差异仍可能影响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因此，进一步吸收行业层面和地区年度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同时为有效降低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对基准回归模型还进行了行业层面的聚类。从表 5 的（3）列~（6）列可以看出，在加入行业固定效应、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及在行业层面聚类后，企业“内卷式”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依旧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和控制其他特征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ntenseC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industry_IV	0.3673***					
	（0.0350）					
IntenseC		−1.1737**	−0.5427***	−0.5626***	−0.5135***	−0.5204***
		（0.5655）	（0.1010）	（0.1070）	（0.1100）	（0.12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087	21087	21216	21073	21211	21217
R^2		0.4294	0.9482	0.9536	0.9482	0.945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3. 替换核心变量

第一，常用于测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还包括 OP（Olley-Pakes）法、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法和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FE）法等[35]。为避免因计算方法差异而导致实证结果偏差，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分别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见表 6 的（1）列~（3）列。在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口径下，企业“内卷式”竞争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第二，考虑到企业“内卷式”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进一步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L. IntenseC*）进行回归。表 6 的（4）列显示，滞后一期的“内卷式”竞争系数仍为负，表明基准结论不依赖于当期变量设定，且上一期低水平竞争状态会延续影响企业生产率表现。

4. 剔除特殊样本

第一，考虑到 2020—2022 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对企业竞争行为的选择，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造成异常影响，为排除其对结论的干扰，剔除该时间段的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中的（5）列。第二，考虑到直辖市在政策环境和企业构成上与其他省份存在系统性差异，直辖市企业的“内卷”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争夺高端人才和政策红利上，为排除其对结论的干扰，剔除直辖市企业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6 的（6）列。结果表明，在剔除特殊样本后，企业“内卷式”竞争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剔除特殊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TFP_OP	*TFP_OLS*	*TFP_FE*	*TFP_LP*	*TFP_LP*	*TFP_LP*
IntenseC	−0.6426*** (0.1129)	−0.5211*** (0.1097)	−0.5030*** (0.1107)		−0.4606*** (0.1168)	−0.5109*** (0.1169)
L. IntenseC				−0.2178** (0.11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217	21217	21217	16961	15491	17303
R^2	0.9136	0.9618	0.9657	0.9508	0.9451	0.9448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三）机制检验

1. 加剧产能过剩

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CU*），以衡量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36]。表7的（1）列显示，企业“内卷式”竞争显著降低了产能利用率，回归系数为−0.0855且在1%水平显著。（2）列进一步检验产能利用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产能利用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表明“内卷式”竞争导致企业盲目扩张产能，扭曲了要素市场并阻碍企业技术进步。验证了“内卷式”竞争通过加剧产能过剩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假设H2得证。

2. 弱化内部控制

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IC*）来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表7的（3）列显示，回归系数为−0.5618且显著，表明“内卷式”竞争削弱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4）列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内部控制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内卷式”竞争迫使管理重心偏向短期生存，导致内部控制投入减少和职能弱化，损害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验证了内卷式竞争通过弱化内部控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假设H3得证。

表7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U	*TFP_LP*	*IC*	*TFP_LP*
IntenseC	−0.0855*** (0.0146)		−0.5618*** (0.1937)	
CU		6.3817*** (0.0763)		
IC				0.0225*** (0.003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217	21217	21217	21217
R^2	0.7899	0.9870	0.2548	0.9456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四）异质性检验

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与竞争行为本身有关，也取决于企业对竞争压力的承受能力和调整空间。基于这一逻辑，选取三个维度进行检验：一是融资约束，反映企业资金缓冲能力；二是供应链风险，衡量企业在产业链条中的脆弱性与风险暴露水平；三是企业生命周期，捕捉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在资源积累、治理结构与调整灵活性上的差异。

1.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反映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调动外部资金和维持长期投入的能力。融资约束越高，企业越难以通

过外部融资平滑价格竞争、营销投入和账期压力带来的现金流波动，长期能力建设也更容易被短期经营需求挤出。使用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以同行业融资约束中位数为标准，构建虚拟变量将企业分为高融资约束和低融资约束组。表8的(1)列和(2)列结果显示，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组中回归系数为-0.6913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低融资约束组中回归系数为-0.3166且在5%水平上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0.0130$，说明高融资约束水平放大了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资金缓冲不足会强化内卷式竞争带来的效率损失，高融资约束企业资金链紧张，内卷式竞争加剧了市场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价格战、营销战等非生产性投入，挤占了研发创新、效率改进等投资，使其在竞争压力下更易陷入效率下滑的困境。相比之下，低融资约束企业拥有更充裕的资金缓冲和更强的融资能力，可以更灵活地调配资源应对竞争，甚至可能将部分竞争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卷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2. 供应链风险

供应链风险水平与企业采购稳定性、生产连续性和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息息相关，供应链风险水平较高时，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低价抢单和信用压力更容易沿产业链放大，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生产安排。本文使用企业的生产波动与需求波动的偏离程度测度企业供应链风险[37]，然后以同行业供应链风险水平中位数为标准，构建虚拟变量将企业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表8的(3)列和(4)列结果显示，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高供应链风险组中，回归系数为-0.7458且在1%水平上显著；在低供应链风险组中，回归系数为-0.3343且在5%水平上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0.0030$，说明供应链风险加剧了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高供应链风险企业通常已承受较强的供给扰动和成本波动，生产计划的稳定性本就不足，低水平的内卷式竞争进一步压缩了其调整空间。供应链风险较低的企业交易网络相对稳定，能更有效地吸收内卷式竞争带来的波动，维持生产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

3. 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生命周期反映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资源基础和调整余地。随着企业由成长走向成熟乃至衰退，其扩张动力和调整能力会逐步变化，内卷式竞争的负面影响也可能随企业发展阶段而发生变化。本文采用综合得分判别法将得分最高的1/4定义为成长期企业，得分最低的1/4定义为衰退期企业，中间1/2为成熟期企业[38]。表8的(5)列~(7)列结果显示，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具体而言，其负面影响在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5212和-0.843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成长期企业中，内卷式竞争的影响系数为-0.0627，且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均显著。原因在于，成长期企业通常仍处于能力塑造阶段，对竞争压力的吸收和转化能力相对较强。相对灵活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流程，使其有较强动力通过技术迭代和市场拓展消化竞争压力。因此，成长期企业虽然同样面临低水平竞争，但其更可能将竞争视为动力，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差异化等方式积极应对。成熟期企业往往已占据稳定市场份额，但组织惯性也更强，面对价格竞争和同质化扩张时，容易以维持既有市场地位为目标，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从而陷入同质化竞争泥潭。衰退期企业通常面临市场份额萎缩、盈利能力

表8　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高风险	低风险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1)	(2)	(3)	(4)	(5)	(6)	(7)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IntenseC	-0.6913***	-0.3166**	-0.7458***	-0.3343**	-0.0627	-0.5212***	-0.8432***
	(0.1611)	(0.1307)	(0.1749)	(0.1379)	(0.2141)	(0.1344)	(0.21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0771	10219	9896	10667	2927	10806	6038
R^2	0.9260	0.9667	0.9438	0.9600	0.9653	0.9557	0.9476
组间系数差异	0.0130**		0.0030***		0.0170**	0.0530*	0.003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5)列的组间系数差异p为成长期和成熟期，(6)列的组间系数差异p为成熟期和衰退期，(7)列的组间系数差异p为成长期和衰退期。

下降、资源流失等问题，组织活力和创新能力衰退，内卷式竞争对其而言往往是“雪上加霜”。因此，衰退期企业受内卷竞争的负面影响最大。

（五）进一步分析

为探究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内卷式竞争的平方项（$IntenseC^2$），并进一步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检验。首先，表9的（1）列中，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且显著，平方项为正且显著。Utest检验结果显示，$t=5.12$，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究其原因，在第一阶段内卷程度低于临界值时，企业倾向于采取防御性同质化竞争，如降价、营销战等，导致资源被挤占至非生产性活动，抑制研发与效率改进，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第二阶段临界值附近时，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或被迫转型，行业集中度提升，剩余企业开始寻求差异化、效率提升或技术创新；第三阶段当内卷程度超越临界点后，高强度竞争倒逼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生存压力迫使剩余企业进行差异化竞争，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尽管高强度内卷最终会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与资源浪费，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表9的（2）列~（4）列展示了在25、50、75分位水平上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低生产率组（25分位点），回归系数为-0.2692且显著；中等生产率组（50分位点），回归系数为-0.4864且显著；高生产率组（75分位点），回归系数为-0.6129且显著，说明企业内卷式竞争的负面影响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原因在于，高生产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创新、效率与差异化之上，内卷式竞争所引发的资源错配与恶性价格战，迫使企业将研发资源转向防御性同质化研发，导致研发投入效率骤降，企业为短期生存而牺牲长期技术积累，高生产率企业的发展模式在“逐底竞争”的环境中反而更加脆弱。相比之下，低生产率企业的运营模式往往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规模扩张或价格竞争，内卷式竞争虽然加剧了市场拥挤、侵蚀了其本已微薄的利润，使其难以积累资本进行升级，但这只是其固有发展模式的延续，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限。

表9　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LP	25分位点	50分位点	75分位点
IntenseC	-2.3494***	-0.2692***	-0.4864***	-0.6129***
	（0.2921）	（0.0348）	（0.0918）	（0.0782）
$IntenseC^2$	4.3368***			
	（0.606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1217	21217	21217	21217
R^2	0.9462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标，需要企业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持续创新并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内卷式竞争反映的是资源配置扭曲、创新生态板结与市场信号失真，严重侵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础。本文通过对2009—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内卷式竞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内卷式竞争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从影响机制来看，企业内卷式竞争通过加剧产能过剩、弱化内部控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其负面影响在资金缓冲不足、链条风险暴露较高及组织调整空间较弱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第四，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第五，从分位数回归看，企业内卷式竞争的负面影响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增

强。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精准化的产业政策，依托产融合作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发挥“耐心资本”的长期引导作用，对主动退出价格战、减少非理性营销投入的企业给予贴息支持。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将更多资金投向能够带来效率改进和能力提升的企业，从源头上纠正资源配置扭曲，化解因资源错配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第二，优化产业链治理机制，防范链主企业风险传导与挤压效应。一方面，在关键产业链引入多个链主企业，避免单一链主垄断导致全链内卷，鼓励并规范“链主”企业通过技术带动和质量提升稳定产业链关系，引领产业集群发展和升级方向，而非利用优势地位进行不当挤压；另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融入多元化的供应链网络，通过供应链金融和信用保护增强其交易稳定性，提升其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避免因单一依赖而被迫卷入恶性竞争。第三，强化创新激励与成果转化的制度供给，从根本上扭转竞争范式，驱动企业将竞争焦点从“卷价格”转向“卷技术”。政府应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研发税收激励等政策，引导企业跨越内卷式竞争所带来的“死亡之谷”，缩短企业转型阵痛期，使创新收益能够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第四，应根据企业承压能力和调整空间提高政策匹配度。对资金缓冲不足的企业，应改善长期资金可得性，缓解其因现金流压力陷入低价竞争的倾向；对供应链风险较高的企业，应完善供应链信用支持机制，缓解账期挤压和风险转嫁对企业经营的冲击；针对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政府应主动提供转型指导和补贴，支持其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二次成长；对于长期低效且缺乏转型能力的企业，应畅通市场化退出通道并配套员工再培训计划，从而以更小的社会成本实现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 CHANDLER A D Jr. 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M]. Cambridge，MA：MIT Press，1962.

[2] 王文华，叶沁瑶. 双元创新视角下竞争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19，33(9)：127-133.

[3] 孙洁，殷方圆. 战略差异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6)：75-84.

[4] WASEEM A T. Strategic trading and Ricardian compara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22，195：428-477.

[5] 沈灏，谢恩，王栋晗. 不确定环境驱动下的新产品开发战略选择与持续竞争优势[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9)：117-126.

[6] 诸波，陈余果.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成本结构决策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5)：141-144.

[7] 阳立高，陈樱，张伟豪. 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25(8)：49-62，71.

[8] 赵秀云，李宇铭，刘可意，等. 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财经论丛，2026，42(3)：90-101.

[9] 胡海峰，白宗航，王爱萍. 供应链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4(9)：137-155.

[10] 孟祥瑜，谢获宝，邹梦婷. 政府引导基金提升被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要素投入产出效率视角的检验[J]. 南方金融，2024(11)：3-18.

[11] 黄晶，张乐，明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的偏向性视角研究[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25(4)：89-99.

[12] 曲帅，郑蒋博文，李富强. 人工智能投入与企业生产率：对“生产率悖论”的经验证据[J]. 科学决策，2025(10)：94-106.

[13] 岳宇君，马艺璇. 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探讨——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证检验[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10)：115-128.

[14] 武常岐，张昆贤，周欣雨，等. 数字化转型、竞争战略选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的证据[J]. 经济管理，2022，44(4)：5-22.

[15] 张金昌，王玥雪微. 企业“内卷式”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2026(1)：79-88，98.

[16] 李雪松，高辛睿. 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基于239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5(4)：183-195.

[17] 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312-320.

[18] 王海燕，张占斌. “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 改革，2025(3)：11-21.

[19] 毛强，仲伟东. “内卷式”竞争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与应对[J]. 中国流通经济，2025，39(10)：18-29.

[20] 巨力. 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J]. 求是，2025(13)：33-37.

[21] 白伟，耿晓晨，俞荣建. 产业链内卷式竞争机制及其感知风险效应——基于BERT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191-201.

[22] 郭长林. 财政政策扩张、纵向产业结构与中国产能利用率[J]. 管理世界，2016，32(10)：13-33，187.

[23] 黄卓，陶云清，刘兆达，等. 智能制造如何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产消合一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24，40(5)：40-59.

[24] 黄俊，陈信元，丁竹. 产能过剩、信贷资源挤占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J]. 会计研究，2019(2)：65-70.

[25] 赵婉妤，王立国. 产能过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倒U型影响[J]. 投资研究，2021，40(4)：4-16.

[26] 程俊杰，刘志彪. 产能过剩、要素扭曲与经济波动——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2015(11)：59-69.
[27] 韩洪灵，彭瑶，刘强，等. “小巨人”大效应：专精特新认定、供应链溢出与企业生产率[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2)：177-198.
[28] 刘瑾，赵纳晖，徐松. 数字化持续投入、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统计与决策，2025，41(18)：165-170.
[29] 王娟. 大数据政策如何赋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评估与机制分析检验[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7(5)：62-69.
[30] HAMMERSLEY S J，MYERS A L，SHAKESPEARE C.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disclosure of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302 of the 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8，13(1)：141-165.
[31] 黄贤环，杨钰洁. 内控缺陷整改能够有效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吗?[J]. 南方金融，2022(4)：30-45.
[32] 张川，刘杰. 供应商企业的双元创新对第一大客户依赖的影响[J]. 财务研究，2023(1)：71-84.
[33] 李宏，王云廷，吴东松. 专利质量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宽度视角的探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21(1)：32-46，134.
[34] 廖冠民，沈红波. 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动因、后果及治理[J]. 中国工业经济，2014(6)：96-108.
[35] 鲁晓东，连玉君.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2012，11(2)：541-558.
[36] 杜勇，孙帆，胡红燕.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产能利用率[J]. 财经研究，2022，48(10)：49-63，168.
[37] 刘啟仁，吴绍永，叶承辉.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企业供应链风险——基于供需平衡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2024(2)：1-16.
[38] 梁上坤，张宇，王彦超. 内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价值——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新探索[J]. 金融研究，2019(4)：188-206.

How Does Firms'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Affec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Zhang Zongjun[1], Dang Xinyu[2]

(1. School of Financ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a core manifes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 essential pathway for China's economy to move beyond factor-dependent growth tow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China enters a stage in which growth increasingly relies on the reallocation and upgrading of existing resources, diminishing market-growth dividends and intensifying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have made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o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mong real-sector firms. Using data on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9 to 2024, a firm-level index of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distortions in market behavior, credit pressure along supply chains, and imbalances in human-resource alloca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its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baseline results show that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significantly suppres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pplying an instrumental-variable approach, controlling for ad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the key variables, and excluding special sample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advers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firms facing strong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greater supply-chain risk, and those in the mature or declining stages of their life cycle.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inhibi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rough two main channels: exacerbating overcapacity and weakening internal control.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a nonlinear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shows that its adverse effect becomes progressively stronger as firm productivity increase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firm level.

Keywords: "involution-style" competi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vercapacity; internal control